

花城
译丛

Заведующему П.Г.О.Г.Д.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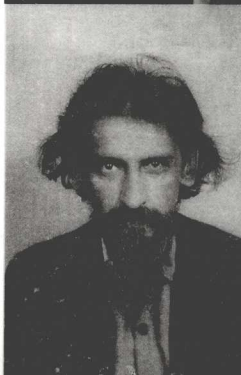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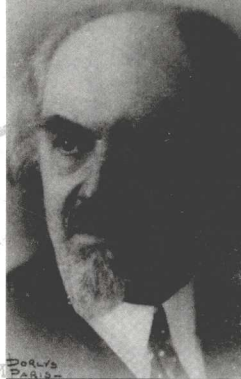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групп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х ученых и
сылаемых за границу, нижеподписавшиеся просят
татья перед германским посольством о выдаче ви
группы и, по получении виз,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все
в Германию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пароходных билетов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ароход 哲学船事件

(俄) 别尔嘉耶夫 等著

伍宇星 编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Заведующему П.Г.О.Г.П.У.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групп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х ученых и литераторов, вы-
сланных за границу, нижеподписавшиеся просят разрешить им хлопотать перед германским посольством о выдаче виз для указанной группы и, по получении виз,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все хлопоты по отъезде в Германию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пароходных билетов и т.д./.

Н. Вассковичский
Н. Лосен

1/2 1999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ароход

哲学船事件

(俄) 别尔嘉耶夫 等著

伍宇星 编译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муз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船事件 / (俄) 别尔嘉耶夫等著; 伍宇星编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1
(花城译丛)
ISBN 978-7-5360-5457-8

I. 哲… II. ①别…②伍… III. 随笔—作品集—苏联
IV. I5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4552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胡雅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封面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2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哲学船及其乘客

(代序)

二十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的内容随着历史书写者身份的变化而被一再改写，俄罗斯（苏联）人的命运也跟着发生戏剧性变化。书写这一段历史，“革命”和发动革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关键词。那些在世纪初曾经期待革命荡涤一切罪恶、却被革命火焰烧得片甲不留、缺席苏联生活七十年的知识分子，终又在世纪末的不流血革命后，跨越时空、堂皇地回到后苏联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甚至被推到更显眼的位置上。今天，借助新的历史书写者的手，我们得以翻阅一件件有着醒目的“机密”或“绝密”字样的卷宗，追寻那些深陷革命漩涡的旧知识分子的身影。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那些侨居国外的俄国文学家、哲学家的名字已经零星地出现在苏联出版物上，但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人员和特别关注那一段历史的人了解一点情况外，绝大多数苏联人都不知道这些旧俄知识分子是如何离乡背井踏上流亡之路的。苏联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克格勃在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少数“里通外国”的“国内侨民”想方设法也多少了解一些他们的境外同胞的创作，一般人的心目中对他们除了笼统的“反革命知识分子”的概念外，一无所知。有心人或许会对《地下反苏组织的覆灭》、《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提及的“1922 年 8—9 月，按照国家政治局的决议，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用行政手段驱逐了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1922 年 8—9 月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用行政手段驱逐了 160 名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部分到国外，部分到北方各省”起疑：那些“最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最积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谁？但是，在苏联条件下，没有人冒险去深究，直到 1990 年。

苏联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整个俄国侨民状况的关注，始于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结出了硕果，思想言论到这时呈现出整个苏联时期前所未有之活跃态势，对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失望让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他们在“境外俄罗斯”的同胞，于是乎，随着 90 年代俄国侨民研究成为显学，那个被称为“境外俄罗斯”的庞大侨民群体得到深入而广泛的挖掘，那些肉体已经永远留在了他乡的侨民思想家们

(个别人的遗骸后来也由后代运回俄国重新安葬)，思想却堂皇地于世纪末回归祖国，他们早年被迫流亡的遭遇被一一追问，到现在基本水落石出。“哲学船事件”便是这一链条上相当重要的一环，“哲学船”乘客们的命运也随之浮出水面。与绝大多数侨民的被迫但主动流亡不同的是，哲学船乘客是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涉及到 20 世纪俄国（苏联）哲学、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哲学船就成为必须言说的词汇。

1990 年，一批作者试图从开始解封的档案史料中追寻这一事件的蛛丝马迹，当时最大的几家报纸如《文学报》、《莫斯科共青团报》、《星火周刊》和最权威的哲学杂志《哲学问题》等近十家报刊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关于“哲学船”事件的文章；2002 年，“哲学船”事件 80 周年，掀起新一轮“哲学船”话题：又一批档案材料被整理发表在权威的历史、哲学学术杂志和大众媒体上，“民主”国际基金会在自己的网络杂志《俄罗斯·20 世纪·文件》2002 年第 8 期上传了 42 份详加注解的各档案馆有关“哲学船”事件的资料，以“哲学船事件”为题的专著《哲学船（史学专论）：1922 年》也在此时问世；2003 年 7—9 月，俄罗斯联邦档案馆举办的“哲学船”主题展览上展出了列宁关注这次行动的信件、便函和相关部门的会议记录、决定、决议等展品；2005 年莫斯科“俄罗斯之路”出版社出版了《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1923 年肃反委与国家政保局文件）》，把在俄罗斯各大档案馆里搜集到的有关“哲学船”事件的近四百份档案文件分类整理，内

容十分详实。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被后苏联俄罗斯史学界命名为“哲学船”的事件全貌，而它之所以被称为“哲学船”，源于这次被苏维埃政权行政驱逐的知识分子中数名被视为俄国哲学界乃至整个知识阶层代表的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是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出境的，于是，1922年夏天开始的苏俄政府对旧知识分子的驱逐行动被1980—1990年代研究这一专题的俄罗斯史家以“哲学船事件”代指，“哲学船”遂成为俄国哲学史和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术语沿用开来。

专政之鞭，你在哪里？

当整个事件的细节都一一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最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苏维埃政权会出此下策？要知道为数不多的旧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初期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大批离境，而当时的俄国基本上只能算是一个文盲国度，一个全新制度的建设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新政权的前途也正是因为这一政权的主力军都没有任何国务活动的经验，如果再加上莽撞，可能就是法国大革命悲剧的重演。而事实上，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苏维埃政权真的凭热情和信念建立起一个表面上全新的无

产阶级专政政权，由于技术的缺位，最终演变成并不比以往的君主专制政权高明的无产阶级中个别人的专政。正所谓：打破旧世界需要的是勇气，建设新社会需要的是智慧。也许，正是因为那些掌握和可以协助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管理技术智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缺位，人类这一全新制度的建设才一步步从阶级专政滑向政党专政，最后则是惨不忍睹的领袖专政。

十月革命后，夺取了政权的俄国左翼政党阵营忙于巩固成果，尚能联合作战，内战甫停，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着手清理异己，昔日为推翻君主政权特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跟他们在同一战壕里奋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现在成了他们独揽政权的敌人，被布尔什维克通过一系列措施清洗掉，使之失去分享政权并参与其建设的机会。正因为缺乏国家管理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想要建立一个真空社会，以便自己的任何政策都能毫无阻碍地出台并顺利实施。后世之师，这其实已经埋下政权变质的种子：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需要全民智慧的事业，结果是全体人民被迫无条件放弃探索，闭着眼睛跟随领袖走进急流。一个不能容纳异己的专制政权（何况这些个异己其实是同党，只是称谓不同罢了），无论其理想多么高尚，技术上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剥夺党外民主意味着党内民主也将成为神话，对于一个全民族只有一种统一思想的国家来说产生领袖个人崇拜现象便是

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无疑违背了革命的初衷。

布尔什维克政权正是在清理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过程中（1922年6—8月）对那些在他们看来“不与新政权妥协”的旧知识分子发起进攻的。这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个清理异己的大动作，所有外部敌人都彻底消失了，俄罗斯“净化”了，从此开始了无后顾之忧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苏维埃的敌人则更多来自“内部”，当初全力支持驱逐知识分子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默许这一行动的布哈林最后都一一落网。

很多俄国研究者试图挖掘这一事件的缘起时，从1922年初列宁的《论战斗的唯物主义》找到了线索：“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认为这里已经公开道出了流放国内“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残余”的想法。

其实，事件的策划也许是个别领导人的专利，但整个领导集体是同意至少默许的。当然，档案里更多地留下了列宁全程关注这一行动的资料：1922年5月19日列宁给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写信“谈谈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时是征询意见式的，要后者把此信转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打算了解他们的“反馈意见”和捷氏的结论。之后不久列宁疾病发作，去了莫斯科郊区休

养；7月尚未痊愈，又发函敦促，一再要求在社会革命党审判结束前完成这一行动；8月，索要驱逐候选人名单并要求汇报抓捕、审讯和驱逐事项进展；9月，要求告知哪些人什么原因取消了驱逐……行动基本上按照列宁的部署进行，说明他的倡议得到政治局的赞同，但并非所有被列宁指名道姓的人员都最终被驱逐（尽管全部上了候选人黑名单）。

也有研究者从托洛茨基化名 O 所写的《专政之鞭，你在哪里》（《真理报》1922 年 6 月 2 日）看出政权的杀气腾腾：那不过是对著名文学批评家尤·艾亨瓦里德的文集《男诗人与女诗人》的评论，批评家对勃洛克的《十二个》的非官方论调令托洛茨基大为光火，威胁要动用“专政的鞭子”。其实传阅过列宁信件的托洛茨基在这里已经透露出鞭子已经举起，秘密警察机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又一桩大事件。因此被驱逐的作家奥索尔金在提到托洛茨基赞同驱逐知识分子时不无幸灾乐祸：不知道他自己被宣布驱逐出境时是不是也投了赞成票。

草拟乘客候选人名单

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 年初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成）机要处直接负责知识分子事务的第四科早已开始“系统搜集教授和作家们的材料”。它在 1922 年 3 月 16 日就汇报了莫斯科几个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活动情况，5 月 15 日又对该报告作

了补充。这些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沿袭革命前的传统，组织一些同好参加的家庭聚会，聚会上有人做专题报告，听者提问形成讨论，这样的形式 19 世纪以来已成为俄国知识界人士重要的交流方式，而这时，他们本来以为已经很小心谨慎，聚会也只是在非常狭小的熟人范围里相互知照，用该报告中的话说，“由演讲者自己决定邀请谁来参加聚会，并且要等到聚会前一天的晚上才通知”，但经验丰富的契卡人仍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不仅聚会地点、时间、人物，而且演讲题目、所有发言内容他们全都了如指掌，尽管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内容。

6 月 3 日，捷尔任斯基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详细列举了高校、社会团体、私人出版社、行业代表大会、合作社、托拉斯、商贸机构和宗教等领域知识分子的反苏活动，诸如高校师生“旨在反对共产党在高校的影响以及在中小学实行积极的阶级原则”的争取高校“自治权”，社会团体中那些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没有积极行动而逃过惩治的反苏分子这时却披着半合法的外衣，“企图扮演掩饰得很高明的传统的政治反对派的角色”等等。

6 月 8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由职业技术教育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组织局的代表组成委员会以研究对策，保证“在下一个学年开始之前对大学生进行过滤，严格限制招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建议国家出版社政治部会同国家政治保卫局仔细检查私人社团、

工会里的专家小组以及个别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所有的出版物；成立由外交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授以在可以不采取更严酷的刑罚的情况下代之以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特定地点的权力”；“由加米涅夫、库尔斯基、温什利赫特组成专门小组以最终审查敌对知识分子团体中应予流放的上层人物名单”。

流放筹备工作理所当然地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来担任，直接执行具体任务的正是有着多年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经验的机要处第四科。7月13日，加米涅夫和温什利赫特小组向政治局递交了草拟的流放名单和有关驱逐知识分子的建议。但因病在莫斯科郊区疗养的列宁却嫌进程太慢，7月16日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抱怨这一行动在他休假前就开始了，而到这个时候还没结束，提出了一千应予驱逐的人名，诸如“比任何一个社会革命党人都有害，因为更狡猾”的人民社会党人别舍霍诺夫、米亚科廷、戈恩费里德等、《经济学家》的所有编辑作者、《文学家之家》和彼得格勒的《思想》的所有作者，他们要么“很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要求“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

7月20日，政治局再次审议驱逐知识分子的筹备工作，认为加米涅夫、温什利赫特小组拟定的名单不够长，证据的说服力不充分，责成三人小组再用一周时间补充同时着手关

闭一系列刊物。22日，温什利赫特给政治局的公务便函提醒必须加快筹备流放知识分子，因为从国外得到消息说白俄侨民已经知道国内正在准备镇压反苏知识分子，教授作家群体都已知晓会有大规模的抓捕和流放。27日，政治局责成加米涅夫、温什利赫特、库尔斯基三人小组研究有关驱逐经费和签证等技术性问题。31日，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名单已经补充完毕，中央执委“关于行政流放的决议草案”也交了稿。

8月2日，温什利赫特分别给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发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记录和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及其身份鉴定。其中列入“莫斯科积极反苏知识分子（教员）名单”的有61人，分别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农业学院、交通工程师学院等高校的教授、3—5月期间擅自聚会的考古学院等三个小组以及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文学家小组；“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名单”——51人，其中包括哲学家卡尔萨文、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索罗金等16人、医生、教授联合会、文学家、涉嫌塔冈采夫案的教授名单。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的决议如下：判处来自彼得格勒等地的11名医生流放俄罗斯北部和东部省份2年；其余人等均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存续近五年的时间里，不与苏维埃制度和解并在苏维埃共和国遭遇外来困扰之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一表述在后来机要处审讯完毕写判决书时像公式一样运用到每个人身上；决

议要求逮捕所有指定人员，三天内向他们宣布指控并建议其自费出境，如拒绝自费则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出资押送，同意自费出境且没有危险者解除看押；确认关闭有潜在反苏倾向的刊物《经济复兴》和《文学札记》和《农业学报》以及有反苏和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杂志。

8月3日，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拖延多时终于提交了经省人民委员会、省教育人民委员会（事关高校教授时）认可、乌共（布）中央执委确认的“从事反苏活动的高校教师和社会活动家名单及其身份鉴定”，这一名单涉及人数为77名，8月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决议通过。

8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驱逐名单（莫斯科名单增加到67人），建议对名单上所有人进行搜查并逮捕有隐匿危险者，其余的则监禁在家中。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流放的决议”通过。

重拳出击

8月16—17日和17—18日夜里，按照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名单，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分别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乌克兰地区进行了搜捕。但战果显然不尽如人意，以莫斯科为例，从17日上午10点第四科给机要处处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仅有一半人数归案，其余的则因各种原因不在抓捕地点。于是采取了各种追加措施，针对他们的抓捕令迅

速下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各下属机构，责令其亲属或住房管理处人员通知前往国家政治保卫局自首，或派员在住宅附近蹲守，抓捕行动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8月18日，第四科科长列舍托夫的报告说当天审问了12个人，并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到8月20日，已有17人结束审讯程序。之所以如此快速，是因为一切都已在事前准备好，审讯过程简单流畅：简单地填一个个人信息表后就回答提问，问题是固定的：对苏维埃政权结构和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分子^①和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对苏维埃政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对俄国境外侨民前景的看法等。然后被审问者手写一份自费出境的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回国的字据，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限期回来向第四科科长处报到。接下来审讯员马上作出判决，无论受审人如何回答提问，结果几乎都一样：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条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判决书也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因为罪行早就定了性——几乎直接引用8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关于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及其身份鉴定的决议”：“自十月大变革之时起直到现在他不仅不与在俄罗斯存续了五年的工农政权和解，而且一刻也没停止过反苏活动，甚至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遭遇外来困扰之际更加强了反革命活动”云云；且处罚方式也早

有规定——驱逐出境。该判决必须告知被审问者并获得他的签字，很多人在签名时附带表达过对判决的抗议，但无济于事。第四科科长在判决书上签字后交由温什利赫特审核签字，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会议再次讨论该案，支持“判决书”中的决定：驱逐出境。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处来说，剩下的就是材料存档了。

8月22日温什利赫特给斯大林的报告说明了整个驱逐行动费用预算，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确认，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驱逐人数一共是217名，其中：莫斯科67人，彼得格勒53人，乌克兰77人。

在短期内迅速完成驱逐的计划似乎遭到了阻碍，给签署出境同意书者的期限很快就到了，但驱逐没能执行。一方面，驱逐费用预算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更主要的是，给被驱逐者办集体签证时遭到德国使馆的拒绝，后来是他们以个人名义申请并拿到签证的：莫斯科名单上的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中曾经写道：“德国大使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给被逐者发放了去德国的个人入境签证，却拒绝了苏维埃政权为被逐者办集体签证的申请”。彼得格勒名单上的哲学家尼·洛斯基在《回忆录·生活及哲学之路》中则有如下回忆：“布尔什维克政府请求德国发给我们签证让我们去德国，大臣维尔特回答说，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不能把俄国公民流放到那里，但如果俄国学者和作家自己请求发给他们签证的话，德国很乐意热情接待他们。因此，彼得堡政府就把我们组里五

十岁以上的人释放了，责成我们给自己和那些年轻些的同志办理签证。”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机构和社会组织纷纷为被捕的人说情，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出来为他们的同学或同事说话：沃隆斯基^②为作家扎米亚金，卢那察尔斯基——彼得格勒大学教授拉普申，加里宁——社会活动家基什金，等等，他们都列举了学者们对苏维埃国家毋庸置疑的意义。波格丹诺夫在动议取消对库克列夫斯基的驱逐时说他是俄罗斯水力发动机及水利工程领域中留在国内的两三个专家之一，还是机器制造领域的优秀设计师，是未来俄罗斯建设难得的人才；奥新斯基（奥博连斯基）^③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竭力为农业问题专家康德拉季耶夫开脱，认为他没有任何政治危险，而且已经开始拥护苏维埃世界观。

8月24日，中央政治局授权捷尔任斯基修改流放名单。31日，由捷尔任斯基、温什利赫特、雅戈达和第四科两位工作人员开会讨论各种说情者的申请，部分地支持了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对14人作出了取消或暂停流放的决定。

8月31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布了题为《第一次警告》的通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决议，教授、医生、农艺师、文学家队伍中的反苏积极分子被流放到北方各省，部分驱逐出境。……苏维埃政权采取的这一预防措施无疑将得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热烈支持，他们急切期待有朝一日把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从俄罗斯苏